

誤判與堅持——
論毛澤東與中國大饑荒（1959—1961）的成因

王力堅

中正歷史學刊第二十四期抽印本

2022年12月

誤判與堅持—— 論毛澤東與中國大饑荒（1959—1961）的成因*

王力堅**

摘要

中國大饑荒（1959—1961）的產生，緣起於大躍進浮誇風導致的誤判；大饑荒的惡化發展，則是基於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對三面紅旗以及社會主義理想的堅持。由大躍進而至大饑荒的發展進程，體現了毛澤東意志的影響。大躍進雖然表現出諸多勞民傷財的弊端，但毛澤東對大躍進的關注與思考，更多是「大好形勢」的表現，由此便導引了中國大躍進形勢的發展方向。在「大好形勢」之中，大饑荒迅速且劇烈地在全國各地惡化蔓延。中共當局大躍進運動的出發點及目標或是為了實現「把中國變成一個偉大、強盛、繁榮、高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的理想，但執著於通過階級鬥爭進行社會經濟制度變革，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做法，不可避免造成經濟或政治的種種誤判，導致大躍進淪為大饑荒。

關鍵詞： 大躍進、大好形勢、饑荒、誤判、堅持

* 本文得匿名專家學者寶貴的審查意見，受益匪淺，謹致深摯謝忱。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暨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Misjudgment and Persistence: On Mao Zedong and the Causes of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9—1961)

Wang, Li-Jian*

Abstract

Pompous ambience gave rise to the Great Famine (1959—1961), while the persistence on Three Red Flags policy and socialist ideals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d by Mao Zedong) worsened the situation of the Great Famine. The process from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the Great Famine reflects Mao Zedong's influence of will. Although the Great Leap Forward demonstrated disadvantages of manpower and treasury exhaustion, Mao Zedong still conside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 manifestation of "great situation", which determined the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 In the midst of the "great situation", the Great Famine rapidly and violently worsen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standpoint and goal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to realize the ideal of "turning China into a great, strong, prosperous, noble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country", but persisting in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reform through class struggle to law and economic restructure inevitably results in various miscalculations on economic or political decisions, which translat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to a famine.

Keywords: Great Leap Forward, great situation, famine, misjudgment, persistence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一、前言

學術界關於中國大饑荒（1959—1961）成因的探討相當多元化，包括中央決策層、地方政府實施層和農民反饋層互動博弈；¹ 各級政府救濟能力不足；² 政府徵購率過高及「城市偏向」的糧食分配政策；³ 政府體制的運作失效；⁴ 人民公社農民退社權的喪失；⁵ 人民公社食堂的失敗；⁶ 糧食政策以及糧食戰爭的影響；⁷ 統購統銷與集體化的交織作用及效應；⁸ 意識形態的錯誤引導與暴力專制的不容糾錯；⁹ 食物供應量的下降及食物獲取權的喪失、公社體制下糧食的交易與配置系統以及一系列相關政策系統扭曲與失靈；¹⁰ 集體化餬口經濟與商品率追求的矛盾；¹¹ 等等。

-
- ¹ 洪名勇、錢龍，〈1959—1961 中國大饑荒：成因、分佈與解釋〉，《貴州大學學報》，2015 年第 1 期（貴陽），頁 89-95。
 - ² 范子英、孟令傑，〈有關中國 1959—1961 年饑荒的研究綜述〉，《中國農村觀察》，2005 年第 1 期（北京），頁 66-71 轉 80。
 - ³ Thomas P. Bernstein,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Vol.13, No.3 (1984): 339-377.
 - ⁴ 李若建，〈大饑荒形成過程中的體制失敗〉，《二十一世紀》，第 106 期（2008，香港），頁 32-43。
 - ⁵ Justin Yifu 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6 (1990): 1228-1252.
 - ⁶ 楊大利，〈從大躍進饑荒到農村改革〉，《二十一世紀》，第 48 期（1998，香港），頁 4-13。
 - ⁷ 宋永毅，〈糧食戰爭：統購統銷、合作化運動與大饑荒〉，《二十一世紀》，第 136 期（2013，香港），頁 68-84。
 - ⁸ 王力堅，〈廣西大饑荒（1959—1961）成因探討：統購統銷與集體化的交織作用及效應〉，《中正歷史學刊》，第 23 期（2020，嘉義），頁 127-170。
 - ⁹ 裴毅然，〈四千萬餓殍——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二十一世紀》，第 106 期（2008，香港），頁 44-56。
 - ¹⁰ 趙德餘，〈糧食危機、獲取權與 1959—1961 年大饑荒的再解釋〉，《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14 年第 4 期（廣州），頁 1-14。
 - ¹¹ 張曙光，〈顧准的探索和貢獻〉，《炎黃春秋》，2015 年第 7 期（北京），頁 40-63。

這些探討主要關涉到制度面、政策面、執行面，頗有見地，然而本文更企望進一步探索上述「成因」的根本所在。

中國官方傳統上多以「『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的混合說法來解釋大饑荒成因。¹²

不過，早在 1961 年 12 月，籌備中共中央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時，劉少奇（1898—1969）與鄧小平（1904—1997）就曾提出：「要科學分析當前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災，也不是赫魯曉夫撕毀全部協議和合同，而是我們工作中的錯誤。」¹³ 這樣一個說法，明確聚焦於中共自己的人為錯誤——無疑也包括毛澤東（1893—1976）的錯誤。在 1962 年 1 月中共中央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即坦承：「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¹⁴

學界對此不乏論述，如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¹⁵ 便著重於通過對中共政治體制運作與政治鬥爭議題的論析，探討了毛澤東與大饑荒成因的關係，可謂學界將大饑荒直接歸因於毛澤東的代表性論著。本文則嘗試在馮客著作未及充分關注的觀念史角度切入，進一步論證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如何在中國現實政治、經濟與社會運作中發揮作用，以致造成激進狂熱的大躍進與慘絕人寰的大饑荒。

事實上，在集權政治體制與計畫經濟體制下，全國性大饑荒的原因

¹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24。

¹³ 吳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中）〉，《黨的文獻》，1996 年第 5 期（北京），頁 82。「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1953 至 1964 年為蘇共最高領導人，臺灣常用中譯名為「赫魯雪夫」。

¹⁴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 年 1 月 30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 24。

¹⁵ 馮客著，郭文襄等譯，《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新北市：INK 印刻，2012）。

難免不追究到中共執政當局尤其是毛澤東的身上。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錯誤或有諸多因素合成，其中重要的一點，無疑是來自其個人的威望與意志，由此促成亦左右了中共各級政府做出種種經濟上或政治上的「誤判」，並在中共領導人出自對崇高理想的「堅持」下，導引大躍進走向了大饑荒。

雖然「誤判」與「堅持」的現象亦已為學界所周知，但鮮有專題研究者。故本文從「『唯意志論』催發大躍進」、「『大好形勢』下的大饑荒」、「雪上加霜的非理性操作」、「『無意』抑或『有意』」幾個方面，聯繫具體翔實的史料，對「誤判」與「堅持」現象的淵源流變及其跟上述幾方面的互動關係，進行更具系統而深入的論證、剖析與探討。

二、「唯意志論」催發大躍進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1894—1971）提出蘇聯要在15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毛澤東受此激勵，「事先沒有經過充分的醞釀，也未與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商量」，¹⁶ 便在會議上發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長篇講話」，「是即席講話，沒有講話稿」，¹⁷ 提出15年後鋼產量「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¹⁸

於是，全由毛澤東一錘定音，只有豪氣與激情而沒有現實基礎與可行性評估的「超英趕美」決策成為大躍進的目標與口號。

1958年2月18日，毛澤東在為《人民日報》所撰社論中指出：「在十五年趕上英國和苦戰三年、改變面貌的偉大號召的鼓舞下，群眾不能不要求生產和工作的大躍進，不能不反浪費反保守。燦爛的思想政治之

¹⁶ 參齊衛平、王軍，〈關於毛澤東「超英趕美」思想演變階段的歷史考察〉，《史學月刊》，2002年第2期（開封），頁67。

¹⁷ 閻明復，《閻明復回憶錄（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427。

¹⁸ 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630-644。

花，必然結成豐滿的經濟之果。」¹⁹ 後二句直接昭示實現大躍進的關鍵，是意志高於理性、精神產生物質的觀念。這顯然是精神萬能的唯意志論體現。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撰文提出，要實現「超英趕美」的目標，依靠的是「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所謂「共產主義精神」、「政治覺悟」、「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發」的要求與強調，其立論依據無不來自精神萬能的唯意志論。因此，毛澤東進一步認定「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並認同應舉農業合作社「完全有把握，而且爭取超過」達到將小麥畝產從150斤提高到800斤的計畫。²⁰

這表明精神萬能的唯意志論不僅落實到運動的氣氛與士氣，還落實到對糧食增產數額的極大化追求上。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正式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批評不相信農業可以快速發展的思想，強調「現在信心高了，是由於農業生產大躍進，農業躍進壓迫工業，使工業趕上去，一齊躍進，推動了整個工作」，²¹凸顯了農業在大躍進中的先鋒作用。會議更將「超英趕美」的時間表提前：「七年超過英國，再有八年超過美國。」²² 一個月後，

¹⁹ 〈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人民日報》，1958年2月18日，第1版。

²⁰ 以上參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含注釋，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77-182。

²¹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二）〉（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出版項不詳），頁75。

²² 參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三）〉（1958年5月20日下午），《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頁84。

毛澤東再提出「兩年超過英國」。²³ 至 1958 年 9 月初，全國人民公社化高潮之際，「超英」已不足掛齒，於是毛澤東徑直呼籲：「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²⁴

「超英趕美」時間表如此變化莫測地神速縮短，顯見其決策的主觀性、隨意性，更顯見大躍進的迫切性，「多快好省」也就聚焦於一個「快」字了。

於是，1958 年 6 月 21 日《人民日報》社論題目就直接標示「力爭高速度」，內文更一再提出：「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並且強調「人民的主觀能動性有非常偉大的作用」、「當大家都想快、要快、力爭快的時候，事情的進展果然就快了」。²⁵ 大躍進期間「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口號便是這種思維的詩意表達。²⁶

不僅速度無極限，能量亦是無極限發揮。1958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報》社論宣稱：「總路線使我國五億農民的無比巨大的力量像火山一樣地爆發出來，震天動地，翻江倒海。」、「農民們發揮了高度的主觀能動性，創造了奇跡。」、「我國糧食要增產多少，是能夠由我國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決定了。」、「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²⁷ 於是，也就有了大躍進的經典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²⁸

從毛澤東指示、中共決策，到媒體宣傳、大躍進實踐，由上而下，充分反映了精神萬能的唯意志論的深刻影響。

²³ 逢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 373。

²⁴ 逢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頁 431。

²⁵ 〈力爭高速度〉，《人民日報》，1958 年 6 月 21 日，第 1 版。

²⁶ 〈「一天等於二十年」這句話的來歷〉，《人民日報》，1958 年 7 月 15 日，第 7 版。

²⁷ 〈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麼？〉，《人民日報》，1958 年 7 月 23 日，第 6 版。

²⁸ 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民日報》，1958 年 8 月 27 日，第 3 版。

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即有強烈的自信心：「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²⁹ 以及「以天下為己任」且「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³⁰

受宋明心學哲學家、泡爾生（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8）和楊昌濟（1871—1920）等中西思想家的影響，青年時代的毛澤東體悟、總結出其獨特的意志觀。³¹

其時，毛澤東雖然承認「人為自然律所支配」，但也更認定「自然有規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規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雖微，而不能謂其無影響」；³² 並從個人心志，發掘出與宇宙本源相通的真理，乃至作用於家國天下的社會實踐：「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³³ 這種契合了毛澤東個性人格的唯意志論，對其日後人生無疑有深刻的影響。

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認為，馬克思主義中也存在著「唯意志論」。在階級鬥爭尖銳、革命形勢高漲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的「唯意志論」往往排斥其他客觀因素而當道。列寧主義強化了「唯意志

²⁹ 毛澤東，〈游泳（1917年）〉，李世昌編，《毛澤東詩詞鑒賞大全》（南京：南京出版社，2001），頁510。

³⁰ 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三，1919年8月4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356。

³¹ 參Frederic Wakeman, Jr.,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55-273.

³² 參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頁246-247。

³³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頁73。

論」的傾向，並在史達林主義中達到巔峰。³⁴ 這正是毛澤東「唯意志論」的另一思想淵源。

莫理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即指出：列寧關於黨的思想基礎之一是唯意志論，毛澤東往往以極端形式，反映列寧唯意志論對歷史中的主觀因素作用的強調，而且，還完全是依賴於人的願望、能力和覺悟，因此，毛澤東主義的世界觀，是「以極端唯意志論為特徵的」。³⁵

Frederic Wakeman, Jr.的著作從歷史與意志的哲學角度透視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認為毛澤東主義是一種「混合體」（the hybrid quality），尤為強調意志、精神在歷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該書結語為：「沒有意志就沒有歷史。而沒有歷史也就完全沒有意志。」（Without will there would be no history. And without history, no will at all.）³⁶ 並作注釋闡明個人崇拜及獨裁在中共歷史中的重要性。³⁷

這些論述，將毛澤東個人意志在中共歷史中的地位、作用與意義，放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事實上，以毛澤東個人意志為主導的唯意志論，也已然是中共革命與建設的決策思想基礎，落實到大躍進運動中，便是貫徹執行精神萬能的唯意志論。於是，不切實際、漫無邊際的浮誇風氣席捲全國，糧食「高產衛星」層出不窮。

《人民日報》和各地報刊的主要版面不斷刊登農業「高產衛星」的新聞，僅《人民日報》1958年6月至9月便有如此報導：湖北省穀城縣樂民社小麥畝產 2,357 斤。³⁸ 河北省魏縣六座樓社小麥畝產 2,394

³⁴ 參 Herbert Marcuse, *Soviet Marxism – A Critic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1), 130.

³⁵ 莫理斯·邁斯納著，張寧、陳銘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 76-77、84、89、177。

³⁶ Frederic Wakeman, Jr.,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277-327.

³⁷ Frederic Wakeman, Jr.,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370.

³⁸ 〈小麥豐產的新紀錄樂民社畝產 2,357 斤〉，《人民日報》，1958年6月9日，第1版。為了便於分辨，本文所有超過百位的數字（包括引文的數字），一概採用千位分隔符號。

斤。³⁹ 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小麥畝產 3,530 斤。⁴⁰ 湖北省穀城縣先鋒農業社小麥畝產 4,689 斤。⁴¹ 河南省西平縣和平農業社小麥畝產 7,320 斤。⁴² 福建省閩侯縣連阪農業社早稻畝產 5,806 斤。⁴³ 湖北省應城縣春光農業社早稻畝產 10,597 斤。⁴⁴ 安徽省樅陽縣高豐社早稻畝產 16,227。⁴⁵ 湖北省麻城縣建國一社早稻畝產 36,956 斤。⁴⁶ 廣東省連縣中稻畝產 60,437 斤。⁴⁷ 1958 年 9 月 9 日，更出現廣西環江毛南族自治縣「併苑六十畝左右」創造出中稻畝產逾 13 萬斤的全國最高記錄。⁴⁸

這種反科學的操作得到科學家的大力支持。1958 年 4 月 29 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學森（1911—2009）便已刊文宣稱：「只要我們能夠附上工人階級的皮，我們就可以跟六億人民在一道，我們的力量真是無窮無盡，絕對不會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於是，「從能量方面來考慮」，得出「可以在一畝面積上年產約八千市斤的澱粉」的推想。⁴⁹

³⁹ 〈六座樓社的新紀錄一畝產麥 2,394 斤〉，《人民日報》，1958 年 6 月 11 日，第 1 版。

⁴⁰ 〈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二畝九分小麥畝產 3,530 斤〉，《人民日報》，1958 年 6 月 12 日，第 1 版。

⁴¹ 〈湖北又一高產紀錄後來居上先鋒社出現畝產 4,689 斤〉，《人民日報》，1958 年 6 月 23 日，第 1 版。

⁴² 〈7,320 斤——小麥層層加碼〉，《人民日報》，1958 年 7 月 12 日，第 1 版。

⁴³ 〈連阪社再創高產新紀錄早稻畝產五千八百多斤〉，《人民日報》，1958 年 7 月 18 日，第 5 版。

⁴⁴ 〈早稻畝產超過萬斤春光社創 10,597 斤高產紀錄〉，《人民日報》，1958 年 7 月 31 日，第 1 版。

⁴⁵ 〈安徽高豐社試驗田開放大紅花早稻畝產一萬六千多斤〉，《人民日報》，1958 年 8 月 10 日，第 1 版。

⁴⁶ 〈一顆早稻大「衛星」〉，《人民日報》，1958 年 8 月 15 日，第 1 版。

⁴⁷ 〈廣東窮山出奇跡一畝中稻六萬斤〉，《人民日報》，1958 年 9 月 5 日，第 1 版。

⁴⁸ 〈廣西四川雲南中稻創畝產 6 萬—13 萬斤紀錄〉，《人民日報》，1958 年 9 月 18 日，第 7 版。另參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 337-340。

⁴⁹ 錢學森，〈發揮集體智慧是唯一好辦法〉，《人民日報》，1958 年 4 月 29 日，第 7 版。

《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報導，毛澤東在山東歷城縣視察時，了解到北園農業社「五十畝高額豐產田，原來計畫畝產兩萬斤，現在我們要爭取產四萬斤，過去一畝只產二、三百斤」，表揚社主任李書成：「好，你這個人，不幹就不幹，一幹就幹大的。」⁵⁰ 可見毛澤東對「高產衛星」的喜愛、支持、鼓勵。同日《人民日報》社論宣稱，1957年中國單季稻畝產最高紀錄 2,400 多斤，比往年增長 14 倍以上，花生畝產最高紀錄 1,500 多斤，比往年增長了 6 倍。該社論特別強調：

毛澤東同志在 1955 年冬就說過：「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農作物的高產量。」今年的農業豐產，完全證實了毛澤東同志的科學的預見。

所謂「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農作物的高產量」無疑是反科學的噱語，卻被推崇為「科學的預見」，由此社論提出了「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的口號。⁵¹ 此口號的思想基礎即精神萬能的唯意志論。

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態度高度一致，《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報導，劉少奇視察江蘇常熟縣和平公社，公社黨委書記宣稱「畝產可打一萬斤」，劉少奇追問：「一萬斤，還能多些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⁵² 就在前 4 天——9 月 26 日，《人民日報》便刊載了副總理陳毅（1901—1972）的文章〈廣東番禺縣訪問記〉，聲稱親眼所見「水稻畝產幾萬斤、甘蔗畝產幾十萬斤、番薯畝產一百萬斤」的事實，證明「這是馬列主義理論掌握了人民群眾，人民群眾掌握了馬列主義所產生的無比威力」。⁵³

可以說，在大躍進熱潮中，全國上下——從中共領袖到科學家到基層幹部及農民的思維與行為，莫不體現了唯意志論的深刻影響，充分實

⁵⁰ 〈毛主席視察山東農村〉，《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第1版。

⁵¹ 以上參〈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第1版。

⁵² 〈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第2版。

⁵³ 陳毅，〈廣東番禺縣訪問記〉，《人民日報》，1958年9月26日，第3版。

踐了毛澤東 41 年前的願景：「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⁵⁴

在這樣一個形勢之下，決定了大躍進的指導思想，便是人定勝天、精神萬能的唯意志論；同時，也決定了大躍進的生產模式，更多是採取通過各種方式鼓勵和促使地方政府，在主要的經濟指標上展開以速度及數量為標準的群眾性競賽運動。⁵⁵

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在 1959 年 1 月 13 日至 26 日召開的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上，即號召「展開熱火朝天的群眾競賽運動」。⁵⁶ 而事實上，各地大躍進生產競賽早就轟轟烈烈開展。

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毛澤東在廣西首府南寧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嚴厲批評了反冒進，又提出一些超過實際可能性的高指標而被會議一致通過，這就直接導致『大躍進』的開始發動」，⁵⁷亦從而導致「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發展」。⁵⁸

受到南寧會議激勵，於 1958 年 1 月底開始，廣西當局即召開系列會議，傳達南寧會議精神，大張旗鼓推行大躍進。⁵⁹ 8 月 28 日，更發出〈關於開展高額豐產競賽運動的決定〉，要求立即進行大動員、大宣傳、大辯論，實行五級幹部田間大會師，開展大檢查、大評比，掀起以「高額豐產」為目標的競賽高潮。⁶⁰

毛澤東十分贊成生產競賽的做法，認為「競賽的方針提得很正確，全國都應當這樣做」。⁶¹ 然而，大躍進由上而下操作的生產競賽運動，無疑產生兩方面的誤導：其一，在生產過程中，無視生產規律與經濟規

⁵⁴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 年 8 月 23 日）〉，頁 73。

⁵⁵ 參周飛舟，〈錦標賽體制〉，《社會學研究》，2009 年第 3 期（北京），頁 54-77。

⁵⁶ 〈組織好更大更全面的農業生產高潮〉，《人民日報》，1959 年 2 月 3 日，第 1 版。

⁵⁷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 780。

⁵⁸ 廣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 324。

⁵⁹ 廣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頁 325-328。

⁶⁰ 參廣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頁 328-329。

⁶¹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 488。

律，採取政治動員、群眾運動的方式，尤其人民公社化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產紀律化、生活集體化的模式，造成生產資源乃至生活資源的大量消耗、浪費與破壞。其二，在成果追求上，基於「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成豐滿的經濟之果」的唯意志論，理想引導現實，精神取代物質，一味求大（目標）求高（指標），更激發了浮誇乃至造假風氣的盛行，所謂「高產衛星」便是如此操作的產物，而「高產衛星」又進一步致使政府產生誤判——按照「高額豐產」收成比例施行高額徵購。於是，不僅「高產衛星」的虛幻豐收榮景化為烏有，還剝奪了農民應得的糧食，致使農民普遍陷入缺糧饑饉的困境。

在 1959 年 9 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方面用自己學會游泳來論證「一有意志，萬事皆成」；一方面宣示：「我們戰勝地球，建立強國，一定要如此，一定要如此。」⁶² 表明事無巨細皆可憑藉事在人為、人定勝天的意志而成之。這樣一種精神萬能的唯意志論決定並促使廬山會議後大躍進再次激進發展，以期實現毛澤東「極端的意識形態和發展目標」（*extreme ideological and developmental goals*）。⁶³

顯而易見，大躍進的浮誇風與生產競賽都是唯意志論的產物。生產競賽運動不僅在實質上對農業生產方式及收成造成巨大破壞與損失，而且其虛假浮誇的躍進氣象與繁榮景象，既是中共當局對形勢誤判的結果，更致使中共當局在此誤判下持續導引大躍進走向大饑荒。

三、「大好形勢」下的大饑荒

毫無疑問，大躍進表現出諸多勞民傷財的弊端，但毛澤東對大躍進的關注，更多在於「熱氣高，幹勁大」、「精神振奮，鬥志昂揚，意氣風

⁶² 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9月11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 523-524。

⁶³ 參 Thomas P. Bernstein, "Mao Zedong and the Famine of 1958—1960: A Study in Willfulnes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86 (2006): 421-445.

發」的躍進氣象，於是也就更多關注與強調「大好形勢」的繁榮景象，由此導引了中國大躍進形勢的發展方向。大饑荒也正是在「大好形勢」下降臨。廬山會議剛結束不久，毛澤東便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國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簡報〉，並有針對性地做了批示：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及反黨分子完全看不見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主流是什麼，他們抓起幾片雞毛蒜皮作為旗幟，就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事業猖狂進攻，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們收到很多省、市、區的報告，都是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捷報飛傳，聲勢大振，如同貴州一樣。⁶⁴

1958年貴州全省實現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如虎添翼，虛報浮誇作假風氣日益盛行，農業生產出現高指標、高估產，隨之誤導進行糧食高徵購。農民的糧食受到極大剝奪，缺糧饑饉的災情在各地農村迅速蔓延，以致1959年貴州省成為大饑荒重災區之一。據貴州省公安廳「縮了水」的統計數據，「全省1959年至1961年共餓死250多萬人，佔全省災前總人口的14.7%」。⁶⁵貴州省委的簡報不無粉飾太平之嫌，毛澤東卻如獲至寶並借題發揮，大力渲染「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捷報飛傳，聲勢大振」的大好形勢，並將饑荒災情嘲諷為「幾片雞毛蒜皮」。這樣一個批示顯示了毛澤東某種非理性的情緒化表現。這正是毛澤東在大躍進乃至大饑荒時期常有的精神狀態。

宋永毅探討毛澤東在文革中的表現指出：毛澤東的非理性對歷史進程起到巨大作用，「毛澤東從不諱言、更自傲於他自己的非理性行為。……他的種種非理性行為導致了中華民族甚至是整個當代世界史上的最大的人道災難。」⁶⁶

⁶⁴ 毛澤東，〈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簡報的批語（1959年8月30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479。

⁶⁵ 參晏樂斌，〈貴州的大饑荒年代〉，《炎黃春秋》，2012年第5期（北京），頁57-60。

⁶⁶ 宋永毅，《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新北：聯經，2021），頁36。

事實上，毛澤東這種非理性表現，在大躍進—大饑荒時期已經甚為充分。毛澤東在獲得〈嵯岬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第二次草稿）〉後，於1959年7月23日在廬山會議講話中即表示：「我得到那個東西，如獲至寶。你說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點，不然我為什麼如獲至寶呢？」⁶⁷ 毫不掩飾其非理性的情緒化表現。

於是，廬山會議前後，毛澤東尤多脫離現實的「大好形勢」非理性判斷：「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⁶⁸、「全國形勢大好，好人好事肯定佔十分之九以上。」⁶⁹、「積極方面是形勢大好，這是主要的。」⁷⁰

現實形勢，且以河南信陽為例——1958年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開展後，河南信陽地區浮誇風盛行，糧食產量虛報現象嚴重。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強行按虛報產量的徵購標準向農民徵糧，大饑荒急速惡化，致使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造成1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⁷¹ 在前述非理性的情緒感染下，1960年10月，毛澤東對河南「信陽事件」作指示時，仍堅持其一年多前對全國整體形勢「捷報飛傳，聲勢大振」般的樂觀判斷：「〔信陽〕三分之二的地區是大好形勢，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勢。」⁷² 十多天後，毛澤東更將這種判斷放大到全國形勢：「全國大好形勢，佔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佔三

⁶⁷ 參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北京：中共黨校出版社，2016），頁518-519。

⁶⁸ 毛澤東，〈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7月2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76。

⁶⁹ 毛澤東，〈堅決制止重刮「共產風」等違法亂紀行為（1960年3月23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164。

⁷⁰ 毛澤東，〈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1960年3月30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頁166-167。

⁷¹ 參賈豔敏、許濤，〈「大躍進」時期河南大饑荒的暴露過程〉，《江蘇大學學報》，第14卷第3期（2012，鎮江），頁61-67。

⁷² 張德生傳達毛澤東語。轉自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冊）》（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頁77。本文引文中的方形括弧〔〕為引者所加，弧形括弧（）則為原文所有。

分之一的地區。」⁷³ 當時各地已普遍發生大規模死人現象，毛澤東仍持如此判斷，顯見舉重若輕的態度。

毛澤東這種舉重若輕態度的心理因素，當來自其異於常人的唯意志論。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以「準備最後災難」為題發表談話：

要準備大災大難。赤地千里無非是大旱大澇。還要準備打大仗。戰爭瘋子甩原子彈怎麼辦？……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換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滅亡，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⁷⁴

這種舉重若輕、視生命如草芥的淡定表述，應和了毛澤東早年所謂「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的祈願。⁷⁵ 果不其然，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後，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席捲全國，「大災大難」、「赤地千里」的大饑荒接踵而至，確確實實「導致了中華民族甚至是整個當代世界史上的最大的人道災難」。

舉重若輕態度的心理，也可說是毛澤東出於經濟或政治理由對形勢的誤判。

如果說，大躍進超英趕美目標的高起點，總路線只突出「快」字的策略，人民公社生產競賽運動操作及漫無邊際浮誇風虛構的大豐收景象，在經濟上誤導了中共高層對糧食形勢的判斷；那麼，到了1959年4月17日，毛澤東指示周恩來（1898—1976）以「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為題擬文件，送與15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應該是已了解大饑荒實情。⁷⁶

⁷³ 毛澤東，〈在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上的批語（1960年11月15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49-350。

⁷⁴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二）（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頁79。

⁷⁵ 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頁177。

⁷⁶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頁466。

然而，1959年8月廬山會議後，乃至1960年「信陽事件」曝光，毛澤東仍然堅持「大好形勢」的判斷，並且將「信陽事件」的發生歸咎於「地、富、反、壞篡奪了領導權」，無疑已是基於政治理由的誤判。⁷⁷ 其實，這正是體現毛澤東長期以來所堅持的階級鬥爭意識，毛澤東的個人威望與意志也由此得到極大化地發揮作用。

「延安整風」期間，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確認毛澤東為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規定「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而且強調「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⁷⁸ 以中央文件的方式賦予毛澤東個人獨裁專斷的權力。

大饑荒期間，1960年3月24至2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鄧小平在會議上稱：「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領導成員是不同的。」⁷⁹ 名為「集體領導」，實權卻落在「代表人／領袖」身上，再次確認了毛澤東凌駕集體領導之上的「地位和作用」，「定於一尊、一錘定音」已然是中共體制化的統治方式與決策模式。

可見，毛澤東在長期黨內外鬥爭中所形成的領袖人格奠定亦強化了這種統治方式與決策模式。毛澤東對此頗為自覺且自得，甚至不諱言自己是「獨裁者」，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即宣稱：「罵我們是秦始皇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⁸⁰ 由大躍進而至大饑荒的發展進程，莫不體現了毛澤東如此強烈的個人意志影響。到了廬山會議，彭德懷（1898—1974）「上書」毛澤東之後，毛澤東原本要反左傾的立場急速轉變為反右傾，階級鬥爭

⁷⁷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冊）》，頁37。

⁷⁸ 參達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430。

⁷⁹ 達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頁362。

⁸⁰ 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摘要）（一）（1958年5月8日下午）〉，《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頁72。

意識更急速膨脹，對現實的觀察、對問題的理解、對形勢的判斷，便都從政治鬥爭、階級意識出發。跟彭德懷等人意見相左，毛澤東便認為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鬥爭」，進而在全國範圍開展反右傾運動。⁸¹ 於是，毛澤東的意志無不影響、左右了中共各級政府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做出種種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誤判，並進而導致大躍進步步走向大饑荒。

這些誤判的思想根源，無疑是中共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堅持。中共建立人民公社的主旨，就是為了「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⁸² 在中共的意識裡，人民公社即如以色列思想家塔爾蒙（Talman J.F.）的「政治救世主義」（political messianism）所主張，是一種「預先設定的、和諧的、並具有十全十美的計畫的模式」；⁸³ 是絕對的信念，是不能反思、不能懷疑的「第一前提」。⁸⁴

於是，高唱「大好形勢」，儼然是時代的主旋律。然而，民間的聲音卻是大唱反調——山東農民說：「合作化好，缺糧又缺草，牲口死不少，人也吃不飽。」⁸⁵ 貴州農民說：「人民公社好，一天三頓吃不飽。老人小孩都不安，由入下水淹死了。」⁸⁶ 四川農民說：「新麥才收完，

⁸¹ 毛澤東，〈對八屆八中全會《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決議稿的批語和修改（1959年8月2日—17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406。

⁸² 〈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1958年8月29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447。

⁸³ 塔爾蒙著，孫傳釗譯，《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頁2。

⁸⁴ 陶東風，〈1962年對大躍進的反思為什麼不能徹底〉，《炎黃春秋》，2015年第5期（北京），頁44-45。

⁸⁵ 〈山東農村鳴放出來的錯誤與反動言論（1957.9.20）〉，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2014），電子版。

⁸⁶ 〈貴州省開陽縣五級幹部大會偏激錯誤言論彙集（1960—1961）〉，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

徵購多欠交。形勢無限好，五里雙餓殍。」⁸⁷ 廣西農民說：「千好萬好，不如分田到戶、搞單幹好。」⁸⁸ 這些聲音被視為「錯誤與反動言論」，認為是敵對勢力的惡毒攻擊。⁸⁹

於是，無論基層民怨如何沸騰，經濟形勢如何不堪，只要能堅持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政治正確，「社會主義事業的主流」便是「捷報飛傳，聲勢大振」、「形勢大好」。就在這樣一種「大好形勢」之中，大饑荒在廬山會議後迅速在全國各地惡化蔓延開來。

當時下放河南省商城監督勞動的顧准（1915—1974）在日記中感慨：「歷史要重寫的。謊話連篇，哀鴻遍野，這一段歷史如何能不重寫？」⁹⁰ 所謂「哀鴻遍野」的形容，顯然沒有誇張成分，完全是當時河南（乃至全中國）鄉村大饑荒慘況的真實寫照；而「謊話連篇」的現象，顯然就是為了迎合毛澤東情有獨鍾的「大好形勢」。

四、雪上加霜的非理性操作

大饑荒期間，中共當局採取一些有針對性的救急應對措施，如整頓人民公社、推廣「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救治饑荒病患等，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饑荒的危害。⁹¹ 與此同時，中共當局卻也因「誤判」與「堅持」，採取了一些顯然是非理性的操作，致使大饑荒雪上加霜地蔓延惡化起來。

⁸⁷ 〈五里雙餓殍（1961年，四川民謠）〉，引自李盛照蒐集，《飢餓集》，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

⁸⁸ 〈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關於廣西農村有不少黨員幹部鬧單幹的情況簡報（1962.2.28）〉，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

⁸⁹ 〈山東農村鳴放出來的錯誤與反動言論（1957.9.20）〉，收入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

⁹⁰ 顧准，《顧准日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1959年12月27日〉，頁199。

⁹¹ 參王力堅，〈廣西大饑荒中政府與農民的應對〉，《興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19，臺中），頁37-76。

1960年是河北省饑荒最嚴重的一年，中共河北省委於1960年12月17日向華北局和中共中央報送的〈中共河北省委關於浮腫病情況的簡報〉承認：「自從今年1月到11月底，全省累計發生浮腫病人58萬多人，死亡4,759人。現有患者18.3萬人，其中城市8.5萬人，農村8.5萬人，較重的佔17%。因農村漏報較多，實數將在20萬以上。」⁹²就在這種情形下，河北省委仍然大力催促各地加緊徵購糧食。1960年11月8日，中共河北省委在〈關於切實安排好群眾生活問題的緊急通知〉中強調：「11月份必須十分抓緊糧食過秤入庫工作。今年糧食徵購，各地必須在保證47.6億斤的前提下，力爭完成49億斤。」⁹³題為「安排好群眾生活」，內文卻要求超額徵購糧食。從災情嚴重的農村強制性超額徵購糧食，對農民生活的損害必然是雪上加霜。

顯然，強制性徵購的糧食，主要供給城市及重工業地區。也就是說，在國家發展工業化戰略的考量之下，中共當局不得不採取「壓農村保城市」的策略，以更極端的方式（如反瞞產運動）蒐集糧食保證城市及重工業地區的需要。⁹⁴於是，中共中央於1960年6月至1961年10月，便一再發出緊急調運糧食支援北京、天津、上海及遼寧等重工業區的指令。⁹⁵如果說「壓農村保城市」的做法尚可理解，那麼，下面的做法則令人不可思議了。

1957年11月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對國際形勢作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⁹⁶此後，中共對形勢的判斷往往更

⁹² 引自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冊）》，頁539。

⁹³ 引自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冊）》，頁540。

⁹⁴ 參文浩著，項佳谷譯，《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97-124；Justin Yifu Lin and Dennis Tao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0, No.460 (2000): 136-158.

⁹⁵ 參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十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頁307, 351-35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十五冊）》，頁12、436-437、526-52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十八冊）》，頁273-274。

⁹⁶ 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8日）〉，頁630。

為自覺地立足於樂觀的國際主義視野。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對國內外形勢作分析，認為「總的趨勢是東風壓倒西風」。⁹⁷ 同年12月，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認為：國際形勢的總特點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⁹⁸

對此現象，中共資深外交官吳建民（1939—2016）指出：「這就是對當時國際形勢最大的誤判。……對世界形勢誤判了，國內的政策也跟著錯，搞『大躍進』、超英趕美、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導致了三年大饑荒。」⁹⁹

執著堅持「東風壓倒西風」的形勢誤判，促使中共當局在大饑荒期間依然堅信「大好形勢」而繼續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忠於國際主義立場」，堅持要「在同別的友好國家和各國人民的互助合作中進行自己的建設」。¹⁰⁰

因此，陷於大饑荒困境的中共當局仍然繼續進行逆勢操作的出口與援外。這樣的逆勢操作，主要體現為如下兩個方面：

（一）超額徵購來的糧食有相當一部分用以增加出口

1958年底至1959年初，周恩來與鄧小平先後對糧食出口作指示。周恩來從堅守誠信上強調：「寧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但是要履行對外已簽的合約。」鄧小平則從日常生活角度提議：「如果人人節約幾個雞蛋、一磅肉、一磅油和十二斤糧食，整個出口的問題就會完全解決。」¹⁰¹

⁹⁷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頁428。

⁹⁸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公報（1958年12月17日新華社公佈）〉，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頁654。

⁹⁹ 吳建民，〈中國外交的基本戰略判斷〉，《領導文萃》，2016年第20期（福州），頁30-31。

¹⁰⁰ 〈展望六十年代〉，《人民日報》，1960年1月1日，第1版。

¹⁰¹ 均引自馮客著，郭文襄等譯，《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頁97。

其實，周、鄧的考量當是出自「忠於國際主義立場」的道義擔當，與蘇聯爭奪國際社會主義集團的領導地位，可謂為了「大局」而犧牲「局部」的價值判斷。但當時饑荒現象已在各地農村蔓延，對外慷慨援助的考量雖然基於制度國策卻也不免是脫離現實的誤判。這種誤判，甚或會產生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批評的：雖出自良好動機卻缺乏有效資源，因而表現為盲目亦顛預的「制度性惡意」（institutional bad faith）。¹⁰²

由是，中共中央於 1959 年 2 月 3 日至 1960 年 11 月 14 日，相繼發佈或轉批一系列加緊糧油出口的報告與指示。¹⁰³

不可思議的是，抓緊糧油出口與抓緊調糧救急城市有時卻同時進行，而且前者壓倒後者。

如 1960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轉批財貿辦公室關於要求全黨抓緊糧食調運、抓緊出口收購、抓緊副食品生產和供應的報告〉，便是在「北京只能銷七天，天津只能銷十天，上海已經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十個城市只能銷八九天」的糧食嚴重危機下，規劃了「今年糧食出口收購計畫一百億斤」。¹⁰⁴

於是，中國糧食出口運作可謂「逆勢而行」：1957 年全國的糧食出口量為 209.26 萬噸，1958 年便上升為 288.34 萬噸，1959 年更激增到 415.75 萬噸，大饑荒最為嚴重的 1960 年仍出口糧食 272.04 萬噸（經濟恢復良好的 1965 年也只出口糧食 241.65 萬噸）；而 1958 至 1960 三年的糧食進口量則分別是 22.35 萬噸、0.2 萬噸、6.63 萬噸。¹⁰⁵ 出口糧食

¹⁰² Pierre Bourdieu,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189-202。

¹⁰³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十冊）》，頁 108-111、194-20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十二冊）》，頁 155-159、265-26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十四冊）》，頁 351-355、518-52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十五冊）》，頁 399-402。

¹⁰⁴ 〈轉批財貿辦公室關於要求全黨抓緊糧食調運、抓緊出口收購、抓緊副食品生產和供應的報告〉，收入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十四冊）》，頁 352。

¹⁰⁵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冊）》，頁 837-838。

中包括作為「飼料」的穀物，卻是深陷於大饑荒的中國百姓的救命糧。1959年6月，中國某貿易代表提議，不應該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口那麼多「豬飼料」，這些「豬飼料」需要用來養活中國人。¹⁰⁶

1960年，全國性大饑荒已經爆發。東歐一些國家，從官方報紙上了解到中國糧食大豐收，要求中國增加糧食出口。中共當局為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不斷增大糧食出口量，1960年向東歐地區出口糧食就猛增到84.7萬噸，比1959年提高了50%。¹⁰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1902—1997）在1962年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承認，1960年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大出口的一年。¹⁰⁸

地處經濟落後邊疆的廣西，不僅在大躍進高潮中緊跟激進路線，通過集體造假創造出中稻畝產逾13萬斤的全國最高記錄，糧食出口亦不落人後。且看如下表格：

附表：1953—1961年廣西糧食部門供應出口大米實績表
（單位：萬公斤）

年度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出口數量	5,783	2,989	2,431	3,951	8,209	10,129	16,810	7,211	5,319

從表格顯示可見，自統購統銷開始實施的1953年起至1961年，廣西糧食出口超過1億斤的只有1958年與1959年；1960年與1961年雖然不及1957年，但是也遠超過1954年、1955年及1956年；1953年雖然比1961年稍多，但是仍少於1960年。¹⁰⁹

¹⁰⁶ 參馮客著，郭文襄等譯，《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頁96。

¹⁰⁷ 蔡天新，〈對三年困難時期「代食品運動」的再認識〉，《延安大學學報》，第35卷第5期（2013，延安），頁39。

¹⁰⁸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頁121。

¹⁰⁹ 以上表格及有關論述參廣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糧食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129。

然而，據《廣西通志·人口志》載錄，1958至1961年，正是大饑荒肆虐廣西之際，其中1959至1961年，三年廣西共死亡145.10萬人，平均每年死亡48.36萬人，年平均死亡率為22.15‰，遠超於11.84‰的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是中共建政後廣西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時期。¹¹⁰

如此惡果，顯然跟糧食出口從1956年的3,951萬公斤倍增至1957年的8,209萬公斤，又一再激增至1958年的10,129萬公斤與1959年的16,810萬公斤有密切關係。

（二）在自己千萬國民死於饑饉的艱困時期，中共當局還慷慨大方地以低息、免息無償向亞非拉國家提供援助¹¹¹

1957年1月，毛澤東提出國際形勢有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¹¹² 要求中共當局對屬於「被壓迫民族」的亞非拉國家採取主動、積極爭取與支持的態度，以期建立並領導世界性的反帝統一戰線。

中蘇決裂後，毛澤東更明確爭奪世界性陣營領導權的決心。1961年12月26日，在北京舉行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表示：「我們要定於一，修正主義也要定於一，還不說帝國主義。是爭領導權的問題，我們只管我們這一塊天下定於一，別人的我們不管。」¹¹³ 此方針貫徹、執行於大饑荒時期。

1960年是中國大饑荒災情最為嚴峻的一年，「為了體現國際共產主

¹¹⁰ 廣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人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頁61。此處採用之「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參李閻榕、萬克峰，〈「三年自然災害」真的餓死3,000多萬人嗎？——對茅于軾先生《饑荒餓死人估算方法》的驗證〉，《當代經濟研究》，2013年第12期（長春），頁83-89。該文經聚類分析，判定1955和1956為正常年，基於這兩年的全國人口死亡率的平均值，設定「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為11.84‰。

¹¹¹ 所謂「亞非拉國家」，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中南美洲）等民族獨立國家和爭取民族獨立的國家。

¹¹² 逢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頁69。

¹¹³ 逢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63。

義精神，中共領導人仍然咬緊牙關堅持對外援助」——援助幾內亞大米 1 萬噸，援助阿爾巴尼亞小麥 1 萬 5 千噸，援助剛果小麥和大米 5 千噸至 1 萬噸。老撾（寮國）、埃及、坦尚尼亞與尚比亞等國家，也都得到中國的慷慨援助。¹¹⁴ 朝鮮因具有「鮮血凝成的友誼」，¹¹⁵ 儘管 1960 年「是中國開始進入『大饑荒』的一年」，「中國政府還是克服困難，向朝鮮提供了 23 萬噸糧食」。¹¹⁶

1960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要求「大規模地動員群眾，採集和製造代食品，以克服困難，渡過災荒」。4 天後（11 月 18 日），周恩來接見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經濟代表團，一方面承認 1959 年遭遇很大災荒，糧食比預定計畫減產百分之三十；一方面表示：「儘管如此，只要友好國家比我們困難大，我們一定盡力援助。」同月 30 日，在與古巴革命政府經濟代表團討論貸款償還問題時，周恩來稱：「如果有困難，可以推遲償還」、「如果還有困難，還可以經過談判不還」。¹¹⁷

1962 年初，中國尚未完全擺脫大饑荒的肆虐，便承諾對外援助 69 億多元人民幣，受惠者包括越南（指北越，下同）、朝鮮、蒙古、阿爾巴尼亞等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以及柬埔寨、巴基斯坦、敘利亞、索馬里等民族獨立國家。

1962 年以後，援外數額超過了償債，中共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1906—1974）認為這種援助「超出了中國的實際承受力」，建議適當

¹¹⁴ 參蔡天新，〈對三年困難時期「代食品運動」的再認識〉，頁 40；舒雲，〈糾正與國力不符的對外援助——中國外援往事〉，《同舟共進》，2009 年第 1 期（澳門），頁 40-41。

¹¹⁵ 李周淵（朝鮮政府代表團團長），〈鮮血凝成的友誼和團結萬歲〉，《人民日報》，1958 年 10 月 1 日，第 8 版。

¹¹⁶ 沈志華、董潔，〈朝鮮戰後重建與中國的經濟援助（1954—1960）〉，《中共黨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北京），頁 57。

¹¹⁷ 俱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中卷，頁 369、370-371、373。

調整。毛澤東拒絕接受王稼祥的建議。¹¹⁸

如此「慷慨無私」的國際主義，養成了「國際友人」習以為常甚至是理所當然的思維定勢。自 1954 年起，中共當局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折合人民幣 100 多億元，1969 年，時任副總理李先念（1909—1992）問到訪的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主席謝胡（Mehmet Ismail Shehu，1913—1981），打算什麼時候還？謝胡說根本沒有考慮還。¹¹⁹

作為「唇齒相依的鄰邦」和「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親密兄弟」，越南歷來受到中共當局特別重視。¹²⁰ 毗鄰越南的廣西，即使在大饑荒災情嚴重之際，仍承擔繁重的對外援助任務。

1959 年以來，廣西的形勢持續惡化，1960 年更遭受嚴重旱災，全自治區 91% 的縣發生水稻春旱，36 個縣、市受災，受災面積 347.15 萬畝，損失糧食 8,602.16 萬公斤。就在這個形勢背景下，1960 年 11 月，以越南農業司長何泰南為首的越南諒山省邊境幹部參觀團，到憑祥、寧明、龍津等縣市參觀訪問，轉達諒山省委向南寧地委提出的多項援助要求。廣西方面表示，基本可以滿足。¹²¹

1961 年依然是廣西大饑荒災情甚為嚴重的年分，仍承擔了頗為繁重的援外基礎工程建設任務：派出多個工作組赴越南援建高平省伏和糖廠，並無償援助越南進行小型水電站的勘測、設計、施工、安裝工作，完成了諒山省的回朝和高平省的三龍兩座小型水電站的規劃、設計。此外，廣西還先後派出工作組遠赴非洲索馬里承建國家劇院等 11 項工程。

122

由上可見，在大饑荒期間，中共當局要求自己國民「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同時，實行對內超額徵購並對外慷慨援助的做法，無疑是基於對國內外形勢的嚴重誤判，不從實際出發、背離實事求

¹¹⁸ 舒雲，〈糾正與國力不符的對外援助——中國外援往事〉，頁 41-42。

¹¹⁹ 舒雲，〈糾正與國力不符的對外援助——中國外援往事〉，頁 43。

¹²⁰ 參毛澤東，〈毛澤東等祝賀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十五周年的電報（1960 年 9 月 1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 284。

¹²¹ 參廣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頁 346。

¹²² 參廣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頁 351。

是原則的非理性操作，導致大饑荒雪上加霜地持續蔓延、惡化。因此，社會各行各業受到極大破壞，更多民眾（尤其是農民）被推向災難性的大規模死亡深淵。

五、「無意」抑或「有意」

中共當局及其領導人在經濟或政治的種種誤判，應當出自不同的原因，在主觀上亦應當有「無意」與「有意」之別。

經濟上所謂「無意」的誤判，即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高層或許是確實相信虛假浮誇的躍進氣象與繁榮景象，從而被誤導做出高徵購等錯誤的決策。誠如薄一波（1908—2007）所說：「農業浮誇提供了錯誤的信息，導致了一系列戰略決策的失誤，這是『大躍進』最大的教訓。」¹²³ Bernstein 亦曾分析，高徵購導致了蘇聯 1932 至 1933 年和中國 1959 至 1961 年的饑荒。然而，蘇聯的高徵購是有意而為之，中國的高徵購則是由於對當時情形誤判造成的。¹²⁴

1960 年 4 月 30 日，毛澤東在停靠天津的火車專列上，跟譚震林（1902—1983）、廖魯言（1913—1972）、劉子厚（1909—2001）、萬曉塘（1916—1966）等政府高官的談話可見玄機：其時正值大饑荒最為嚴峻之際，譚震林卻宣稱，糧食形勢是好的，死人是個別的，農民有相當多糧食吃，每天吃一斤，人的臉都紅光滿面。毛澤東也表示不相信因農民缺糧而需要「統銷面很大」的說法，質疑農民有瞞產現象。譚震林補充強調，農民手裡有糧食。毛澤東說，那好呀，那我又舒服一點。並表示相信廖魯言、譚震林關於 1960 年糧食收成會超過六千億斤的保證。

125

於是，1960 年 6 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

¹²³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頁 539。

¹²⁴ 參 Thomas P. Bernstein,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339-377.

¹²⁵ 逢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頁 382-383。

澤東儘管承認「去年災荒實在估計不足，真正的估計不足；今年又是北旱南澇」，仍然強調「國內、國際，總的形勢很好，切不要以為形勢不好」；「總路線是正確的，過去十年是有成績的」；在「留有餘地」的條件下，要求工農業總產值五年平均遞增達 20%至 22%。¹²⁶

然而，毛澤東的所謂「相信」，或許更多還是策略性的考量。1958年8月上旬，毛澤東視察河北省的徐水縣、安國縣和定縣，大為讚揚：「這裡的幹勁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辦就不辦，一辦就辦得很多！過去幾千年都是畝產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幾千上萬！」¹²⁷事實上，與其說毛澤東相信由「一二百斤」躍進到「幾千上萬」的「成就」，不如說是相信並且需要這些群眾「不小」的大躍進熱情與幹勁。因此，威廉·韓丁（William Howard Hinton, 1919—2004）儘管反對「把毛和毛主義者斥為偏激、極左、烏托邦、唯意志論」，但是也承認「毛曾經高估過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情，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端風潮興起打開方便之門」。¹²⁸

可以說，這就是毛澤東的「有意」誤判，即毛澤東偏愛群眾的熱情與幹勁，並以此推動大躍進。從 1958 年 1 月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對「洩氣」現象的強烈反應已可見一斑：「一反就洩了氣，六億人一洩了氣不得了。」「鼓足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洩氣？」「反『冒進』，六億人民洩了氣。」「我們就怕六億人民沒有勁，不是講群眾路線嗎？六億洩氣，還有什麼群眾路線？」¹²⁹毛澤東如此反洩氣，顯然就是為了鼓足大躍進幹勁，甚至為了鼓足幹勁而不惜容忍浮誇風，否則出身於農村而且中共建政前長期在農村活動的毛澤東，不會看不穿農業大躍進中畝產從一二百斤衝到幾千上萬斤乃至十幾萬斤的高產衛星騙局。

¹²⁶ 逢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頁 422-423。

¹²⁷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報》，1958年8月11日，第2版。

¹²⁸ 威廉·韓丁，「大逆轉：中國的私有化（1978—1989）」，頁 65，轉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new01.htm>，查閱日期：2020年5月27日。

¹²⁹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一）（1958年1月11日）、（二）（1958年1月12日）〉，《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頁 6-9。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澤東這樣的思維在各級政府官員的大躍進浮誇操作中得到響應。

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1924—1967）就認為，喊高產口號「就能喊出大家的幹勁來，我們不能洩氣，不喊幾萬斤連 600 斤也搞不到」。¹³¹ 張國忠的理論依據即是：「沒有千斤的思想，就沒有千斤的行動；沒有千斤的行動，就沒有千斤的結果。」¹³² 類似的表述在當時頗為流行，諸如：「沒有千斤思想，就不可能有千斤的產量。」¹³³、「沒有千斤思想，就不能奪取千斤糧。」¹³⁴ 這些表述跟毛澤東所謂「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結成豐滿的經濟之果」如出一轍。

或許正因如此「上下一心」，毛澤東對浮誇造假「心有靈犀」。在視察河北徐水等縣 3 個月後，於 1958 年 11 月 4 日，毛澤東在湖北孝感火車站專列上接見當地政府官員時，對省委副秘書長梅白（1922—1992）所匯報孝感縣長風人民公社畝產萬斤稻穀的事，明確表示「我不相信」。¹³⁵ 1959 年 2 月 2 日，毛澤東在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信中，更道破高產衛星是「把幾十畝田併成一畝拼出來的」。¹³⁶ 同年 4 月 5 日，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坦承，1958 年放的「高產衛

¹³⁰ 參王力堅，〈廣西反瞞產運動的成因和影響〉，《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62 期（2019，臺北），頁 100-109。

¹³¹ 引自李若建，〈指標管理的失敗：「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官員造假行為〉，《開放時代》，2009 年第 3 期（廣州），頁 90。

¹³² 引自張偉良，〈徐水「共產主義」試驗的失敗及其教訓〉，《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3 期（1999，北京），頁 44。

¹³³ 俱見〈力爭上游再上游（社論）〉，《前線》，1959 年第 5 期（北京），頁 2；謝懷德，〈謝懷德副省長在省西八縣、市小麥田間管理現場會議的總結發言（1959 年 3 月 6 日）〉，《陝西政報》，1959 年第 5 期（西安），頁 114。

¹³⁴ 馬耕田，〈高寒山區的高峻風格〉，《中國民族》，1960 年第 1 期（北京），頁 15。

¹³⁵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頁 434。

¹³⁶ 毛澤東，〈關於談哲學等問題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信（1959 年 2 月 2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頁 32，注釋 1 轉毛澤東 1959 年 2 月 1 日下午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星」很多是假的卻沒有更正，因為「如果統一更正，那就垮了」。¹³⁷

毛澤東這種「明知故犯」的表現，在廬山會議期間仍然可見。1959年7月20日，毛澤東還提出要「洩氣」：「有些氣就是要洩，浮誇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洩。」然而到了7月26日，認定「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便堅決反對「洩氣」：「錯誤必須批判，洩氣必須防止。氣可鼓而不可洩。人而無氣，不知其可也。」¹³⁸ 正如論者所批評：「雖然他〔指毛澤東〕對浮誇風和浮誇新聞心知肚明，並作過一些努力減輕浮誇，但由於他堅持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面紅旗』的左傾錯誤，事實上放任了浮誇風和浮誇新聞的蔓延。」¹³⁹

各級政府官員在經濟上、政治上「無意」的誤判，或是真心誠意迷信並服從領袖與中央的決策。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繼當年1月南寧會議反洩氣之後，再次強烈反對洩氣、主張冒進（躍進），並且提倡「正確的」個人崇拜。¹⁴⁰ 於是，中南局書記兼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1908—1969）表示：「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政治局委員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1902—1965）更宣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¹⁴¹ 對此現象，陳永發精闢地闡釋道：「毛澤東透過對科學真理和愛國主義詮釋權的取得，進而壟斷道德的合法性」，「在中國共產黨內外享受到的擁護和盲目崇拜」；以致「征服許多中國知識份子，視其為科學真理（馬列主義）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代言人」。¹⁴²

¹³⁷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頁464。

¹³⁸ 參逢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頁108、118。

¹³⁹ 靖鳴、劉銳，〈1958年「大躍進」期間浮誇新聞的成因及其啟示〉，《視聽》，2008年第11期（南寧），頁14。

¹⁴⁰ 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一）（1958年3月9日）、（二）（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頁30-34。

¹⁴¹ 參羅平漢，〈助推「大躍進」運動的成都會議〉，《黨史文苑》，2015年第9期（南昌），頁22-28；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上卷，頁259。

¹⁴² 陳永發，〈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書評）〉，《中央

在當時的中國官場，無論是推動大躍進還是遭遇大饑荒，像陶鑄、柯慶施這種真心誠意迷信並服從毛澤東領導的各級官員應不在少數。西方學者即指出，中國大躍進期間發生的大饑荒，是由於毛澤東的旨意得到無數「普通的」地方官員（a myriad of “ordinary” local cadres）自願參與（the willing participation）。¹⁴³

至於各級政府官員在經濟、政治上「有意」的誤判，則應是明知故犯——即劉少奇所批評的「故意弄虛作假，瞞上欺下」、「為了爭名譽、出風頭，不惜向黨作假報告，有意誇張成績，隱瞞缺點，掩蓋錯誤」。¹⁴⁴ 劉少奇沒說透的是，這些現象來自中共政治體制由上而下的巨大壓力。李若建即指出，大饑荒的產生是由於體制的運作失效，而失效的重要原因包含最高領袖「權力過大」、「天威難測」以致各級官員「瞞上欺下」、「人人自保」。¹⁴⁵ 楊大利則將之歸結為基於政治誘因而產生的「代償式政治表忠」現象。¹⁴⁶ 所謂「表忠」，便是出自由上而下的壓力反應。

這種現象的產生，緣自中共歷史中長期頻繁且殘酷的政治鬥爭造成的恐懼心理，以及由此形成的習慣性馴服心態；尤其是經歷了 1957 年的反右運動與 1959 年的反右傾運動，全黨上下乃至全國上下再無人敢於忤逆毛澤東的意志。

於是，在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中共政壇便出現如楊繼繩所抨擊的現象——各級官員基於「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維護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迴避的：個人利害關係」；因而，「機變求自保」，「緊跟毛澤東」，「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兇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¹⁴⁷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2 期（2006，臺北），頁 217。

¹⁴³ Chris Bramall, “Agency and Famine i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1958-1962,”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08 (2011): 990-1008.

¹⁴⁴ 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398。

¹⁴⁵ 李若建，〈大饑荒形成過程中的體制失敗〉，頁 32-43。

¹⁴⁶ 楊大利，〈從大躍進饑荒到農村改革〉，頁 4-13。

¹⁴⁷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冊）》，頁 866-905。

作為「黨的喉舌」，報刊便「為了印證『大躍進』政策的正確，不斷渲染鼓勁……為了證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為了迎合黨的主要領導人的喜好，只能隨著當時的風氣起舞」。¹⁴⁸

中共當局政治上的誤判，應當是基於思想觀念上的執著——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堅持。伯納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認為，社會主義既是一種經驗理論亦是一種道德學說，社會興亡與社會內聚力基於生產資料的佔有和控制的關係。¹⁴⁹

其理論學說的內涵是：要求建立更具有群體意識和合作精神的人類結合關係，只有體現更實質的平等，才有助於促進絕大多數人的自由，以及落實博愛的情操。此理想的實現，須以生產關係的重組為前提。¹⁵⁰ 這樣一種理論學說，暗合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的設想：人民公社為變革生產關係提供可行之路，這種變革既包含了建立人與人之間平等的社會關係，更包括生產關係向更高的層次過渡。¹⁵¹

同時，毛澤東更強調，社會經濟制度變革須立足於政治鬥爭：「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農業合作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種嚴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鬥爭。」¹⁵² 從而形成毛澤東「帶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構想」。¹⁵³ 此構想既是毛澤東所預設中國社會應達到的目標，也是他在試圖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集體化運動「左傾」錯誤時不能觸動的底線。¹⁵⁴ 這樣一種底線堅持，已然是昧於事實亦昧於理性的「認

¹⁴⁸ 靖鳴、劉銳，〈1958年「大躍進」期間浮誇新聞的成因及其啟示〉，頁11-12。

¹⁴⁹ 伯納德·克里克著，蔡鵬鴻、郝德倫譯，顧曉鳴校閱，《社會主義》（臺北：桂冠，1992），頁102。

¹⁵⁰ 參許國賢，〈社會主義的當代意涵〉，《東吳政治學報》，第27卷第1期（2009，臺北），頁124。

¹⁵¹ 高遠戎，〈「大躍進」期間的資產階級法權討論及影響——試析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些構想〉，《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3期（北京），頁78。

¹⁵² 毛澤東，〈《嚴重的教訓》按語〉，《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449-450。

¹⁵³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418。

¹⁵⁴ 高遠戎，〈「大躍進」期間的資產階級法權討論及影響——試析毛澤東對社會主義

知僵化」(cognitive rigidity)。¹⁵⁵

歸根到底，這就是中共不可動搖的社會主義理想的堅持。如果說大饑荒的產生，緣起於大躍進浮誇風導致的誤判；那麼，大饑荒的惡化發展，則是基於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在「大好形勢」鼓舞下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堅持。在現實中，這樣一種理想的堅持落實到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態度上。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對彭德懷等人的鬥爭，便是以為後者要否定三面紅旗。¹⁵⁶

毛澤東認為，三面紅旗互為依存、缺一不可。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於1959年9月15日在各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稱：「大躍進不應該搞，人民公社不應該搞，那麼總路線還有什麼？總路線就要崩潰，總路線就靠這兩條，所以我們要起來保衛總路線，希望各位共同團結起來保衛總路線，支持大躍進、人民公社。」¹⁵⁷

1959年10月1日，周恩來在慶祝建國十周年宴會上的講話，便充分闡明三面紅旗在中國的理論權威性及現實合理性：「我們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原則已經開始找到一條適合於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我們已經展開了一個大躍進的局面，並且在全國農村中建立了人民公社這樣一種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新型組織。」¹⁵⁸

1960至1962年，大饑荒肆虐全國之際，連續三年的10月1日國慶節當天，《人民日報》頭版均以通欄標題的方式展示了三面紅旗政治圖騰式的意義與重要性：「慶祝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偉大勝利」、「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高舉總路線、大躍

社會的一些構想》，頁83。

¹⁵⁵ 參羅珉，〈組織治理：基於知識治理的整合架構與治理機制〉，《比較管理》，2011年第2期（北京），頁26-39。

¹⁵⁶ 參林源，〈三面紅旗——毛澤東晚年問題的癥結〉，《南京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南京），頁77-84。

¹⁵⁷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頁491-492。

¹⁵⁸ 〈在慶祝建國十周年宴會上周恩來總理的講話〉，《人民日報》，1959年10月1日，第4版。

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奮勇前進」。¹⁵⁹ 於是，三面紅旗崩潰，即表示社會主義理想崩潰，亦即中共政權（執政合法性）崩潰，這也當是前引毛澤東所擔心「如果統一更正〔高產衛星〕，那就垮了」的涵義。

三面紅旗在農村的貫徹過程中，小農私有經濟制度和生產經營方式受到極大衝擊與變革，中央集權體制得以不斷強化與鞏固，然而，政府與農民之間的關係不斷惡化，鄉村農民「一盤散沙」的狀況亦未得到改善反而益發渙散，城鄉之間不平等不平衡的二元結構進一步固化並加深。結果是：儘管生產關係重組了、變革了，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理想並未能實現，反而衍生出始料未及的災難。正所謂：「不會犯錯的權威（infallible authority）這一類的驕傲的假設，往往會帶來不可彌補的禍害；而向不會犯錯的權威俯首稱臣的社會，則會使個人自由與權利陷入極其危夷的處境。」¹⁶⁰

毛澤東的意志，儼然就是中共「不會犯錯的權威」。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充分發揚民主，讓人提意見，總結經驗教訓，但在會議進行中便將安徽「責任田」（即包產到戶）試驗視為背離人民公社集體化道路而進行批判、整肅。¹⁶¹ 同年8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毛澤東一再強調階級鬥爭，狠批能有效緩解災情的「包產到戶」、「單幹風」。¹⁶² 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同時，全力壓制各地農村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風潮。¹⁶³ 在這種形勢下，本來面對災情持較為務實態度，不同程度支持包產到戶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陳雲（1905—1995）、鄧子恢（1896—

¹⁵⁹ 分別見於《人民日報》，1960年10月1日，第1版；1961年10月1日，第1版；1962年10月1日，第1版。其餘年分的國慶節，《人民日報》頭版通欄標題均無與三面紅旗相關的字樣展示。

¹⁶⁰ 許國賢，〈社會主義的當代意涵〉，頁125。

¹⁶¹ 參陳大斌，〈中國農村改革的一次預演——安徽「責任田」興起始末（結束篇）〉，《黨史縱橫》，2004年第12期（瀋陽），頁23-27。

¹⁶² 參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頁1237-1250。

¹⁶³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頁1250-126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602-647、648-657。

1972) 以及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尤其地縣級官員，不得不全面轉向。¹⁶⁴ 前述毛澤東堅持階級鬥爭意識，促使其個人威望與意志得到極大化地發揮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可以說，在三面紅旗的問題上，毛澤東比劉少奇等中共高層領導人更為堅持，而毛澤東的意志顯然起到絕對主導的作用。

有論者認為：「『大躍進』運動初期毛澤東所表現出來的太急、太熱、太冒、太『左』等方面的情緒和理念，客觀地說，是當時中國的社情、國情、黨情、民情在毛澤東等領袖人物身上扭曲而又集中的反映。」

165

其實，似乎更應該反過來理解——中共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由於各種因素形成了全黨公認的毛澤東領袖人格。毛澤東這種領袖人格跟其早年就形成的「偉人」意識一脈相承：「巨夫偉人為一朝代之代表，將其前後當身之跡，一一求之至徹，於是而觀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屬品矣。」¹⁶⁶

大躍進時期「中國的社情、國情、黨情、民情」亦即「此代表人之附屬品」，莫不深受毛澤東這樣一種「巨夫偉人」的意志左右與影響。當然，中國社會生態（「社情、國情、黨情、民情」）的積極反饋（迎合、響應、需求），也無疑使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得到極大化（亦不無惡化）發揮。二者相互作用，促成了激進狂熱的大躍進乃至慘絕人寰的大饑荒。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雖然讚揚蘇共領袖：「那些領導人不僅有頑強、靈活的才智，而且還有鋼鐵一般的意志，他們對自己的事業抱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卻也直言：「他們打

¹⁶⁴ 參蕭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1956—1966）》（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下冊，頁 608-624。

¹⁶⁵ 胡瀟，〈毛澤東研究中「輝格」解釋的反思——從對「大躍進」的考問說起〉，《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 年第 9 期（北京），頁 128。

¹⁶⁶ 毛澤東，〈致蕭子升信（1915 年 9 月 6 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 年 6 月—1920 年 11 月）》，頁 21。

定主意要去實現這一理想，而且要不惜一切手段去實現這一理想。但如果他們沒有那理想的激情，儘管這激情隱藏在鎧甲之下，他們將無法實現這個理想；那理想的激情有時是情緒化的，並帶有烏托邦的色彩。」

167

與之相比較可說，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對形勢的「有意」誤判，即是基於「堅定不移的信念」——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正確性、相信三面紅旗的合理性，相信自己對形勢發展的掌控能力。但情緒化的理想激情終究蛻變為現實的冷酷，烏托邦的色彩亦遮掩不住大饑荒的萬千餓殍。

六、結語

大饑荒雖有多種因素合成導致，但大饑荒產生、發展的邏輯軌跡亦是明顯的：毛澤東的唯意志論貫串於大躍進—大饑荒的整個過程；由上而下唯意志論的盛行，是中共高層及各級政府在經濟與政治上對國內外形勢有意或無意諸多「誤判」的導因；「誤判」的「有意」或「無意」表現，進一步反映中共各級官員的政治生態以及中共治國的行為模式；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以及三面紅旗的堅持，使「誤判」及其後果無法消弭反而益發深重，最終導致大饑荒變本加厲走向禍國殃民的結局。

如果說，前言所列舉的大饑荒成因探討主要關涉到制度面、政策面、執行面；那麼，本文由觀念史角度切入所探討的「誤判」與「堅持」，則更多是著眼於決策面乃至最高決策者，並且關注其決策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效應。換言之，本文通過「『唯意志論』催發大躍進」、「『大好形勢』下的大饑荒」、「雪上加霜的非理性操作」、「『無意』抑或『有意』」幾方面互動關係的考察，揭示了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中共高層的決策

¹⁶⁷ 羅曼·羅蘭著，袁俊生譯，《莫斯科日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頁 164-166。

從決策面普遍而深刻影響到制度面、政策面、執行面。

在決策面上，毛澤東的個人意志無疑起到決定性、主導性的作用，奠定了大躍進「超英趕美」的決策思維，以及「定於一尊、一錘定音」決策模式。大躍進運動決策者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其目標抑或是為了實現「把中國變成一個偉大、強盛、繁榮、高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¹⁶⁸的強國夢，但脫離現實的個人意志的堅持，執著於通過階級鬥爭進行社會經濟制度變革，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的做法，不可避免地造成經濟上或政治上的種種誤判。

這樣一種別具時代特色的唯意志論頗為全面地貫徹、落實到制度面、政策面及執行面。貫徹到制度面、政策面上，便催生了集體化、統購統銷等旨在將生產資源國家化及生活資源國家化的措施與政策，形成由上而下的集權專斷體制以及偏激急進的方針路線；落實到執行面，則產生「維護大局」與「個人利害」交織的政治生態、「鬥志昂揚」與「浮誇造假」交雜的社會風情、「遍地豐收」與「滿目瘡痍」交疊的經濟局面。

於是，大躍進的發展在一連串基於誤判的失控操作下淪為大饑荒，數千萬人在大饑荒中喪生。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田紀雲（1929—）曾作此深刻檢討：

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¹⁶⁹

所謂「瞎指揮」、「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左傾機會主義」的「人

¹⁶⁸ 毛澤東，〈中央轉發廣東省委關於當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指示的批語（1960年3月2日、3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頁40。

¹⁶⁹ 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歷程〉，《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北京），頁4。

禍」，其責任歸屬莫不指向中共最高決策人（層）的誤判與堅持，以及各級官員的「自願遵循與參與」和「代償式政治表忠」。

這樣的「誤判與堅持」，經歷過大饑荒仍未消退——對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窮追猛打、對外援助與出口的加碼升溫、對階級鬥爭的一再強調，乃至於饑荒尚存便進行「四清」，¹⁷⁰旋即無縫接軌地開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¹⁷¹由此顯見，「誤判與堅持」已然成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治國的常態性行為模式。

¹⁷⁰ 參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二十一世紀》，第 60 期（2000，香港），頁 56-68。「四清運動」：於 1962 年底起，中共在農村推行的一場運動。運動最初目標是「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後轉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¹⁷¹ 文革正式開始於 1966 年 5 月 16 日（頒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但此時全國性的四清運動尚未宣告結束，不少地方的文革甚至由四清工作隊主持進行。參翁笑冰，〈「四清」：「文革」的前奏與預演〉，《浙江學刊》，1989 年第 4 期（杭州），頁 57-60 轉 147。

徵引書目

史料

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五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劉少奇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內部發行，出版地點與時間不詳。

- 宋永毅主編，《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電子版，香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2014。
- 季世昌編，《毛澤東詩詞鑒賞大全》，南京：南京出版社，2001。
- 逢先知、馮蕙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 逢先知主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 廣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人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 廣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大事記》，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 廣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廣西通志·糧食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北京：中共黨校出版社，2016。
- 顧准，《顧准日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 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專書

- 文浩著，項佳谷譯，《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與蘇聯的比較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 伯納德·克里克著，蔡鵬鴻、郝德倫譯，顧曉鳴校閱，《社會主義》，臺北：桂冠，1992。
- 宋永毅，《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與文化基因的新闡釋》，新北：聯經，2021。
-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 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

莫理斯·邁斯納著，張寧、陳銘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馮客著，郭文襄等譯，《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新北：INK印刻，2012。

塔爾蒙著，孫傳釗譯，《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閻明復，《閻明復回憶錄（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蕭冬連等，《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1956—1966）》，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羅曼·羅蘭著，袁俊生譯，《莫斯科日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期刊論文

〈力爭上游再上游（社論）〉，《前線》，1959年第5期（北京），頁1-2。

王力堅，〈廣西大饑荒（1959—1961）成因探討：統購統銷與集體化的交織作用及效應〉，《中正歷史學刊》，第23期（2020，嘉義），頁127-170。

王力堅，〈廣西大饑荒中政府與農民的應對〉，《興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19，臺中），頁37-76。

王力堅，〈廣西反瞞產運動的成因和影響〉，《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62期（2019，臺北），頁97-141。

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歷程〉，《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北京），頁4-5。

吳冷西，〈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中）〉，《黨的文獻》，1996年第5期（北京），頁79-86。

吳建民，〈中國外交的基本戰略判斷〉，《領導文萃》，2016年第20期（福州），頁30-34。

宋永毅，〈糧食戰爭：統購統銷、合作化運動與大饑荒〉，《二十一世紀》，第

- 136 期 (2013, 香港), 頁 68-84。
- 李若建,〈大饑荒形成過程中的體制失敗〉,《二十一世紀》,第 106 期 (2008, 香港), 頁 32-43。
- 李若建,〈指標管理的失敗:「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官員造假行為〉,《開放時代》,2009 年第 3 期 (廣州), 頁 84-96。
- 李閩榕、萬克峰,〈「三年自然災害」真的餓死 3,000 多萬人嗎?——對茅于軾先生《饑荒餓死人估算方法》的驗證〉,《當代經濟研究》,2013 年第 12 期 (長春), 頁 83-89。
- 沈志華、董潔,〈朝鮮戰後重建與中國的經濟援助 (1954—1960)〉,《中共黨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 (北京), 頁 48-57。
- 周飛舟,〈錦標賽體制〉,《社會學研究》,2009 年第 3 期 (北京), 頁 54-77。
- 林源,〈三面紅旗——毛澤東晚年問題的癥結〉,《南京大學學報》,1999 年第 4 期 (南京), 頁 77-84。
- 洪名勇、錢龍,〈1959—1961 中國大饑荒:成因、分佈與解釋〉,《貴州大學學報》,2015 年第 1 期 (貴陽), 頁 89-95。
- 胡瀟,〈毛澤東研究中「輝格」解釋的反思——從對「大躍進」的考問說起〉,《馬克思主義研究》,2014 年第 9 期 (北京), 頁 127-136。
- 范子英、孟令傑,〈有關中國 1959—1961 年饑荒的研究綜述〉,《中國農村觀察》,2005 年第 1 期 (北京), 頁 66-71 轉 80。
- 晏樂斌,〈貴州的大饑荒年代〉,《炎黃春秋》,2012 年第 5 期 (北京), 頁 57-60。
- 翁笑冰,〈「四清」:「文革」的前奏與預演〉,《浙江學刊》,1989 年第 4 期 (杭州), 頁 57-60 轉 147。
- 馬耕田,〈高寒山區的高峻風格〉,《中國民族》,1960 年第 1 期 (北京), 頁 15-17。
- 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二十一世紀》,第 60 期 (2000, 香港), 頁 56-68。
- 高遠戎,〈「大躍進」期間的資產階級法權討論及影響——試析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些構想〉,《中共黨史研究》,2006 年第 3 期 (北京), 頁 76-86。
- 張偉良,〈徐水「共產主義」試驗的失敗及其教訓〉,《清華大學學報 (哲學社

- 會科學版》，第 14 卷第 3 期（1999，北京），頁 42-47。
- 張曙光，〈顧准的探索和貢獻〉，《炎黃春秋》，2015 年第 7 期（北京），頁 40-63。
- 許國賢，〈社會主義的當代意涵〉，《東吳政治學報》，第 27 卷第 1 期（2009，臺北），頁 123-154。
- 陳大斌，〈中國農村改革的一次預演——安徽「責任田」興起始末（結束篇）〉，《黨史縱橫》，2004 年第 12 期（瀋陽），頁 23-27。
- 陳永發，〈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書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2 期（2006，臺北），頁 211-219。
- 陶東風，〈1962 年對大躍進的反思為什麼不能徹底〉，《炎黃春秋》，2015 年第 5 期（北京），頁 44-45。
- 舒雲，〈糾正與國力不符的對外援助——中國外援往事〉，《同舟共進》，2009 年第 1 期（澳門），頁 40-44。
- 楊大利，〈從大躍進饑荒到農村改革〉，《二十一世紀》，第 48 期（1998，香港），頁 4-13。
- 賈豔敏、許濤，〈「大躍進」時期河南大饑荒的暴露過程〉，《江蘇大學學報》，第 14 卷第 3 期（2012，鎮江），頁 61-67。
- 靖鳴、劉銳，〈1958 年「大躍進」期間浮誇新聞的成因及其啟示〉，《視聽》，2008 年第 11 期（南寧），頁 10-15。
- 裴毅然，〈四千萬餓殍——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二十一世紀》，第 106 期（2008，香港），頁 44-56。
- 趙德餘，〈糧食危機、獲取權與 1959—1961 年大饑荒的再解釋〉，《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14 年第 4 期（廣州），頁 1-14。
- 齊衛平、王軍，〈關於毛澤東「超英趕美」思想演變階段的歷史考察〉，《史學月刊》，2002 年第 2 期（開封），頁 66-71。
- 蔡天新，〈對三年困難時期「代食品運動」的再認識〉，《延安大學學報》，第 35 卷第 5 期（2013，延安），頁 32-41。
- 謝懷德，〈謝懷德副省長在省西八縣、市小麥田間管理現場會議的總結發言〉（1959 年 3 月 6 日），《陝西政報》，1959 年第 5 期（西安），頁 109-116。
- 羅平漢，〈助推「大躍進」運動的成都會議〉，《黨史文苑》，2015 年第 9 期（南昌），頁 22-28。

羅珉，〈組織治理：基於知識治理的整合架構與治理機制〉，《比較管理》，2011年第2期（北京），頁26-39。

報紙

〈反浪費反保守是當前整風運動的中心任務〉，《人民日報》，1958年2月18日，第1版。

錢學森，〈發揮集體智慧是唯一好辦法〉，《人民日報》，1958年4月29日，第7版。

〈小麥豐產的新紀錄樂民社畝產2,357斤〉，《人民日報》，1958年6月9日，第1版。

〈六座樓社的新紀錄一畝產麥2,394斤〉，《人民日報》，1958年6月11日，第1版。

〈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二畝九分小麥畝產3,530斤〉，《人民日報》，1958年6月12日，第1版。

〈力爭高速度〉，《人民日報》，1958年6月21日，第1版。

〈湖北又一高產紀錄後來居上先鋒社出現畝產4,689斤〉，《人民日報》，1958年6月23日，第1版。

〈7,320斤——小麥層層加碼〉，《人民日報》，1958年7月12日，第1版。

〈「一天等於二十年」這句話的來歷〉，《人民日報》，1958年7月15日，第7版。

〈連阪社再創高產新紀錄早稻畝產五千八百多斤〉，《人民日報》，1958年7月18日，第5版。

〈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麼？〉，《人民日報》，1958年7月23日，第6版。

〈早稻畝產超過萬斤春光社創10,597斤高產紀錄〉，《人民日報》，1958年7月31日，第1版。

〈安徽高豐社試驗田開放大紅花早稻畝產一萬六千多斤〉，《人民日報》，1958年8月10日，第1版。

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報》，1958年8月11日，第2版。

〈毛主席視察山東農村〉，《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第1版。

〈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人民日報》，1958年8月13日，第1版。

- 〈一顆早稻大「衛星」〉，《人民日報》，1958年8月15日，第1版。
- 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民日報》，1958年8月27日，第3版。
- 〈廣東窮山出奇跡一畝中稻六萬斤〉，《人民日報》，1958年9月5日，第1版。
- 〈廣西四川雲南中稻創畝產6萬—13萬斤紀錄〉，《人民日報》，1958年9月18日，第7版。
- 陳毅，〈廣東番禺縣訪問記〉，《人民日報》，1958年9月26日，第3版。
- 〈少奇同志視察江蘇城鄉〉，《人民日報》，1958年9月30日，第2版。
- 李周淵，〈鮮血凝成的友誼和團結萬歲〉，《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日，第8版。
- 〈組織好更大更全面的農業生產高潮〉，《人民日報》，1959年2月3日，第1版。
- 〈在慶祝建國十周年宴會上周恩來總理的講話〉，《人民日報》，1959年10月1日，第4版。
- 〈展望六十年代〉，《人民日報》，1960年1月1日，第1版。

網路資料

- 威廉·韓丁，「大逆轉：中國的私有化（1978—1989）」，轉自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pdf/new01.htm>，查閱日期：2020年5月27日。

英文論著

- Bernstein, Thomas P. "Mao Zedong and the Famine of 1958—1960: A Study in Wilfulnes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186 (2006): 421-445.
- Bernstein, Thomas P.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Vol.13, No.3 (1984): 339-377.
- Bourdieu, Pierre.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 Bramall, Chris. "Agency and Famine in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1958—1962."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08 (2011): 990-1008.
- Lin, Justin Yifu and Yang, Dennis Tao.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10, No.460 (2000): 136-158.
- Lin, Justin Yifu.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No.6 (1990): 1228-1252.
- Marcuse, Herbert. *Soviet Marxism – A Critic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1.
- Wakeman, Frederic, Jr.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